

# 魂系黄花

纪念潘达微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广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  
广东美术馆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美术馆  
GUANGDONG MUSEUM OF ART

THE SOUL OF A REVOLUTIONARY PAINTER  
COMMEMORATING THE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PAN DAWEI

广东文史丛书

纪念潘达微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魂系黄花

广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 编  
广东美术馆

广东人民出版社



潘达微先生像

# 目 录

## CONTENTS

### 前言

### 专论

魂系黄花 潘达微评传 6

### 图版

54

### 潘达微文选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殡葬之情形 194

关于公益慈善的意见 196

画报复活感言 199

觉庐白忏书画录 200

祝优天影出世 204

为改良新戏班致旧班书 205

追祭庄烈帝 206

勇发考古 207

霜花余影记 208

郑懿公传 209

冰天鸿泪 210

### 附录一

国民政府褒扬老同盟会会员潘达微令 215

马小进：潘冷残之画例 216

林志鹏：忆冷道人 217

孤芳：潘冷残先生佚事 218

甄冠南：潘达微先生之生平 219

挽联 221

挽诗 245

潘剑波、李文健访谈录 248

### 附录二

潘达微小传 254

年表 257

### 后记

# 前 言

## PREFACE

发生于90年前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民主革命运动。它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飞跃，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

广东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辛亥革命运动的领袖孙中山先生及其许多追随的革命党人的故乡和重要活动地区，作为民主革命斗士之一的潘达微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一提起潘达微，人们自然就想起黄花岗，而一踏进黄花岗，人们也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潘达微。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即黄花岗之役）失败后，烈士们曝尸街头，无人敢于收殮，潘达微冒险瘞葬忠骨七十二具于其父所办之两粤广仁善堂义地红花岗（即今之黄花岗），后于其上扩建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从此，潘达微的名字与黄花岗紧紧地连在一起，病逝后，人们也将他附葬于黄花岗烈士墓园。世人都知道义士潘达微，知道冒险瘞葬七十二烈士的潘达微，而对于潘达微本人，对于潘达微在政治、艺术等等领域上的影响力和成就等，人们倒是渐渐地淡忘了。诚然，冒险埋葬忠骨是潘达微一生中一道最耀目的光彩，值得我们大书特书，可谓没有潘达微，就没有黄花岗。然而，自古有大成就者，总是具有多方面才能的，除了作为一个革命者外，潘达微在其他许多方面特别在美术方面的成就也足以炫人眼目！如现代美术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新旧之争国画研究会与岭南派画家之争，潘达微便是前者的核心人物。潘达微所画的山水、花卉，清刚雅逸，成就颇高；他又酷嗜摄影，曾有两幅摄影作品作为我国唯一入选的作品参加在日本举办的实真摄影展览，获得国际间的好评，而如果要说到广东的早期漫画，潘达微无疑更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为了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和潘达微先生诞辰120周年，广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和广东美术馆联合策划主编了《魂系黄花》这本书，并聘请了黄大德先生为本书的撰稿者。全书分为“革命巨子”、“美术大家”等9个专题对潘达微的一生从多角度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我们增添新的文史资料，也为广东的美术界积累更多的美术史资料。

广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

广东美术馆

2001年10月

## 魂系黄花

## —潘达微评传

## 上篇

## 短暂而轰烈的一生—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本大书

没有潘达微，就没有黄花岗。然而，这几十年来，潘达微的名字已为人们淡忘了。

潘达微是一个民主主义的斗士，一个“多栖”的奇才，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公益等各个领域中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一生，是中国旧民主革命的缩影。

稍懂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没有潘达微便没有黄花岗。然而，正如与潘达微过从甚密的陆丹林所说，在潘达微逝世后，虽然国府明令褒扬，但“当时许多人都不知道他的履历”。辛亥革命的有关史料，对他虽有记载（如冯自由、陆丹林的忆述），但亦草草。究其原因，一则是因为潘达微在殁葬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前，一直从事地下革命活动，而在革命成功后，“因他素来不出风头”（1），没有向人言及其革命经历；二则是在辛亥革命后，便退出了政坛，专注于社会工作及寄情于艺术，因此，人们对他知之甚少，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也忽略了对潘达微的关注，这是不足为奇的。

从潘氏后人保存的潘达微逝世后各界人士所致送的挽联抄本中可以看到，潘达微不仅有“革命巨子”、“爱国先声”、“民国伟人”之誉，而且有“美术大家”、“实业泰岳”、“报界巨子”、“学界泰斗”、“学务先河”、“戏剧家”、“摄影家”、“慈善良模”、“革命弥陀”之称。这对了解潘达微在清末民初期间在各个领域的活动及所作出的贡献提供了重大的线索。

潘达微，1881年1月15日（庚辰12月16日）出生于今广州沙河东圃镇故居。名允忠，又名虹，字心薇，号达微。别署景吾、大觉等。父潘文卿，清末武官，广州广仁善堂创始人之一。

潘达微年幼多病，曾两年未离病榻，病中卧游于诗文书画间，求医中认识孙中山先生，受其影响，立下“一雪国耻，匡时济世”之志，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旨，追随孙中山革命，为父所反对。与夫人陈伟庄冲破封建家庭笼牢，欲离家出走，在广州河南龙导尾另居。孙中山得知，劝其利用父亲与朝廷上层之密切关系，以世家子弟身份秘密从事革命工作。潘达微通过父亲的朋友的关系，一方面周旋于朝廷要员之中，为革命党人制定革命斗争策略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另一方面，也通过与他们感情的维系，利用他们的地位与权力扭转了不少被动的局面。在那些关系网中，潘达微与“两广清乡督办”江孔殷的交情最深，而江孔殷对潘达微的帮助也最大。1910年庚戌新军起义失败后，清廷又在某军营搜捕新军病兵一名、伙夫四名，“官军欲将其治罪，各善团不允，时适江孔殷到观，由其保释”（2）；辛亥革命殁葬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是潘达微通过江孔殷的周旋、帮助，才得以促成实现的（3）。关于潘达微早年的革命活动，甄冠南曾有《潘达微先生之生平》一文记之：

潘先生祖籍南海，世代书香，少有令名，长尤博学，为人谦逊慈和，夙以侠义称重于乡党，有古君子之遗风，与史坚如既为通家，亦为益友，意气相投，道义相尚，而又能志同道合，所以本党当在兴中会时期，即已参加党籍，从事革命。实则他自十岁以后，就存着一个民族观念，对于孙中山先生之倡导革命，信仰更深，因此乃与史坚如参加兴中会，他的坚贞思想，壮烈志行，也不让于史氏，尤其能疏财，仗义，重气节，这是同志们莫不敬仰其为人的。史氏殉难后，他更坚苦卓绝，散尽家财，以追随中山先生，所以同盟会未成立前，他的家，已为革命工作而化去了大部。可是他的志愿，认为革命尚未成功，依然不改其行，死心地，努力党事。要知他生平受了中山先生之伟大人格，感召太深了。对中国革命必定成功的信心也太大

了。自香港分会成立后，中山先生与冯自由对潘先生的信仰也日益加深了。这以后，他就成为香港分会核心的主要人物，由于他在香港社会之一般关系上，早已树立了一种影响力、号召力，与陈少白等元老重臣，更有一言九鼎的重要性。加以他在法国邮轮上，曾亲受中山先生面示组党机宜，所以香港分会发动吸收新党员之初期，一般侨商领袖人物，如林护、余斌臣、谭肇康等20余人，就因他的信仰关系，热烈加盟。当时征求成绩之最高的，就是潘先生。而且这一大批人物，多数是羊城保险公司董事局的重心，也都是四邑侨港集团之巨头，从这一点关系，就可以明白他生平之一切了。

谁都知，香港南方支部中坚分子，就由潘氏经手，征求而加盟入党者，这一批忠贞30人团之香港党员们，如李煜堂、吴东启之一部分，是由潘老先生的关系了。由于这个中坚分子30人团。

对他原来有着此种特殊关系，所以他的立场，也成为这批人物中的主力。凡熟悉南方支部当年情节的人，谁个不知道潘氏在这个集团中特殊关系的基要因素。因此，香港党员们每次发动筹饷运动时，在冯自由赴加拿大之后，他就成为胡展堂的智囊人物。虽然，他的财力，无法再献巨金，可是他有的是赤胆热心，又有的是人缘信用，是以每次筹饷之能大量成功，他所出的力，确是非常伟大的。

因为他为人是负责任，重言诺，不矜功，不言劳，尤其抱定一个只求革命的成功，不求官禄的意念，这是中山先生与胡展堂生平所最敬重，而信赖的一位同志。辛亥革命成功后，他的处境，也很清淡，中山先生就劝其出任要职，使他本其廉洁自律的志节，一介不取的光明态度，在政坛上标榜示范，岂知潘氏初衷不改，反把其毕生心血与物业，在广州花地，特别创办“孤儿院”，“育婴堂”，提倡社会慈善事业。潘氏这种特立独行，光明磊落的志操，在本党同志中，可算是一位英雄好汉。至于他以不怕死的精神，收拾七十二烈士的忠骸，开出黄花岗上的自由名花，结出中华民国的果实，不特为革命家们，所深心景仰，亦为我千千万万中华儿女心心相印，五体投地，永矢弗不忘的。政府眷念勤劳，特为题赠“志洁腾芳”四字，以为表彰(4)。

这段文字尽管只记述了他在同盟会成立前从事革命组织工作和社会活动部分的事迹，但已足见潘达微不愧是一个辛亥革命的元老。

社会革命的实践，迫使他对中国现状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探索，寻求救国救亡之道。他深信“以中国内政之腐败，无一事不当改革，即无一事不需人材”(5)，于是“投身教育界”(6)，1901年与黄节等在广州创办“群学书社”(即南武公学前身)，“清末历任广东高等学校、南武、述善诸校教员”(7)；在“教育救国”的声浪中，他又从西方教育家“健康之精神，根于健康之身体”的言论中得到启发，悟出了医学与健康之关系，认为医学中分四个层次，“一由于产孕之善；二由于育婴之良；三由于治身之有其法；四由于保身之得其道”(8)。于是他于麦公敏、梁培基等组织了赞育善社(医社)，一面宣传西医接生的科学方法，一方面施医赠药(1908年，他还和梁培基等一起创办了《医学卫生报》，组织“光华医社、医校、医院，取“光我华夏”之意，以“争国权、“争医权”、“争医学教育权”)；而当“世界资本主义与1905年的俄国运动最后唤醒了亚洲。几万万被压抑的、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中的人民醒悟过来，要求新的生活，为争取人底初步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9)的风暴中，潘达微为“提倡民气，启诱愚蒙”，他又投身报界，在《广东日报》、《有所谓报》中撰写了大量针砭时政的政论，唤起人们急迫痛切的国家民族的危亡感，发

出愤激慷慨的救亡呼声。1905年，在全国掀起拒约反美的高潮中，他不仅每日参加演说，而且撰写了《任天下事者不必畏风潮》、《驳中国报之谬论》、《异哉中国报之所谓舆论》(10)等文，“提倡最力，以是知名。”(11)稍后，他受孙中山之嘱，创办《时事画报》(12)于是，他“集同人，振其舌，摇其笔，高呼于五岭以南，而冀人民及早警觉”(13)。《时事画报》先后历时八年，因时局关系，五易其名，不离不弃(14)。而在这八年间，是潘达微从事革命工作的颠峰期，以超乎常人之精力，同时在教育、办报、医学、美术等领域及革命的组织、策划、发动方面竭尽全力，甚至与夫人陈玮庄一起亲自参与了庚戌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的弹药运输的工作(15)。这次广州起义，尽管集中了全国许多革命精英分子，在物资及组织上都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但是由于形势的变化及起义计划的屡次变更，致使起义未能按照原定方案进行。革命党人虽英勇奋战，给予敌人沉重的打击，但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伤亡之惨重，是过去同盟会所发动十次起义各役所未见。死难者的尸体露天弃置于谘议局前。由于清军到处戒严，搜捕党人，故幸存者纷纷化装走避他方。唯潘达微身份尚未暴露，且有报社访员身份作掩护，故挺身而出，负起收殓之责，虽冒万死以赴而不悔。实践了自己“凡办一事，必有一专注之目的”(16)；“凡欲献身于社会，以造一群之幸福者，毁誉无所惊，劳怨无所避，甚而成败利钝无所计。冥情孤往，以求达我之目的而已。世间一切之变幻，云烟过眼视之可也。必如此而后可言大智，必如此而后可言大勇，必如此而后可言大侠”的诺言(17)。

民国之后，孙中山对潘达微益加敬重，与潘达微的关系也益加密切，据家属的回忆，孙中山曾多次在潘家举行秘密会议(18)经“党人众议，举为粤省都督，甚至连库房的钥匙都已交给了他”。(19)但是，“满清既倒，革命之气为之一落千丈。复感于‘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竟改革命党为政党，继复合各党而成国民党，官僚政客，投机分子，悉行渗入党中”。(20)“使得这个有着光荣斗争历史的革命组织完全变质。与此同时，革命党人内部不断发生着攻讦倾轧。同盟会和光复会‘不能调和，日生轧轹’，竟致发展到‘势成水火’……在革命党的主要领导人之间也纠结着明争暗斗”，他们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化，。都督府和省议会之间也酿造着无原则纠纷——‘各争权限，大起龃龉’……革命党人的蜕化使他们在群众中丧失了威信，革命运动恰在发展到高峰的阶段丧失了领导力量。”(21)因此，“旧同盟会党员闻之，多有痛哭者。”(22)潘达微作为革命元老，孙中山劝其出任要职，本意是让他“在政坛上标榜示范”，(23)但潘达微对形势深感忧虑，本其廉洁自律的志节，一介不取的光明态度，退出了政坛。

1913年，龙济光祸粤，接袁世凯之密令，于中秋之夜诱杀陈景华，随即缉捕潘达微。潘即逃至香港，岂料逻者随至，便转遁上海，时上海郑某为镇守使，捕党甚严，潘只好化名陈虹，在朋友帮助下到龙华一徐姓人家的别墅中当园丁。数月后潘达微回到香港，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任职，从此专注于实业与社会公益事业，并曾创办《天荒》及《微笑》杂志。1921年，潘达微皈依佛教，法号妙化。闲余研究丹青及摄影，1929年8月28日在香港寓因病医治无效，结束了短暂而轰烈的一生。

### 黄花岗上党人碑

1911年广州的三月廿九日起义，是孙中山的战争事业中最为光辉的篇章。“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潘达微险些名列黄花岗上。

七十二烈士横尸街头，潘达微冒死收殓烈士遗骸，妥慰忠魂，为中华民族建起了一座历史的丰碑，供后人万世景仰，成为全球炎黄子孙争相瞻仰的革命圣地。

辛亥三月廿九日广州起义，是孙中山的“战争事业”中最为光辉的篇章。自1895年—1910年

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和广大群众为独立、民主和祖国的富强，策划了一次又一次反清武装起义，尽管都因领导不力、缺乏群众基础等原因而失败，但革命党人并不气馁。在1910年新军起义被镇压之后，孙中山召集了同盟会的骨干在槟榔屿召开了重要会议，总结了迭遭顿挫的经验和教训，在广州再举义旗。是役集中了来自全国各省和世界各地的革命志士，在人力物力上做了较充分的准备，但由于形势的变化和起义计划屡屡更改，致使三月二十九日未能按原定方案进行，从小东营五号总指挥部冲出的“选锋”成为孤军，但他们仍在无援的情况下与清军展开了浴血激战，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中有被捕后始遇害者，使为供词，辄挥洒数千言，斥清政府之罪恶，而申民族主义之大义及所以为民众牺牲之由，意气盎然”（24）。“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为之变色。”（孙中山：《黄花岗烈士事略》）这些革命先烈，用自己的鲜血，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悲壮的史诗。

起义失败后，当时的清政府只顾调军队搜捕革命党人，对遗骸收殓全不过问。烈士的遗骸从广州越秀山麓至双门底枕藉街道，直至四月初三，才通知各善堂派仵工把烈士遗骸运送到东门外咨议局前的旷地上，准备葬于臭岗。而幸存的党人，为避免无谓的牺牲，都已纷纷走避各地，唯有潘达微未暴露革命党人的身份，于是，收殓烈士遗骸的重任，便历史地落在潘达微的身上！

关于潘达微殓葬七十二烈士尸体的行动，甄冠南有此记述：

三月二十九日之广州起义，又一次失败了，烈士们之牺牲，又何止七十二人呢？即此七十二个烈士之喋血街头，在当时专制环境下，在可怕之乱党罪名下，又谁敢认友认亲呢？更谁敢挺身而出，收拾这批遗骸呢？血迹斑斑，莫不令人悲伤，而叹死事的凄惨！可以说是惊天动地而泣鬼神！因为这一幕震惊人寰之壮烈事迹，感人太深了。当时未死的同志，多已间道潜逃，四方亡命，只有潘达微先生尚伏匿于河南私宅，眼看烈士们，尸满羊城，真使他痛定而思痛，绕室彷徨，挥泪凭吊，并且思索这批烈士尸骸如何收拾，于是乃本着大无畏不怕死的精神，挺身而出，而一方面，派人到港，向胡展堂与黄克强报告，如何善后，这个问题？并特邀其密友谭肇康到穗，助其行动。一方面，特别把他这件非常行动，先向江孔殷太史商量，请江氏本着公谊私情，大力帮助，向清廷当局斡旋说项，使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幸得江氏也能尽心尽力，得到清廷官方的特准，于是潘先生乃亲率仵工，分头收拾，就捡得这七十二个烈士遗体，安置于东郊外的黄花岗……

潘达微在1921年黄花岗墓落成时，曾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殡葬之情形》一文，详记如下：

辛亥三月廿九之役，吾党举义于广州，攻督署不克，七十二烈士殉焉。时城中百计搜捕党人。越四月三日城门仍半启，侦察出入甚严。余以平民报访员名义，故能于缇骑纵横之际，得往来无阻。是日晨，从南门入，侦知各烈士遗骸已更续移置咨议局前旷地，遂出南门，折而之东郭，则议局前诸烈士遗骸赫然在也。陈尸场上，运者洞察尚严，积尸分数叠，折臂断（月豆），血肉模糊，自不忍睹。余斯时哭不能声，惟有强含酸泪，中心如焚而已。旋离尸场，蹀躞东郊，欲一刺其实况，访诸异尸者，知掩埋之役属善堂，从而葬诸臭岗。臭岗者，吾粤刑人于市，丛葬于岗之巨穴中，掩以浮土，暴骨扬秽，过者掩鼻，故名之曰臭岗。余骤聆耗，

肝肠欲摧，掩泪去而之广仁善堂，以此事诘善董。善董曰：唯官命。余以大义痛陈，谓诸义士为国捐躯，纯为国民谋幸福，彼此亦国民一分子。如是藁葬，良心何以自安？且慈善事业，不计谁是谁非，施棺施地，唯义所应矣。各善董多为动容，转询余办法，余谓官殓刑尸指定地址属善堂，殓埋殆循惯例。若营葬别地，官亦必不深究。余相机复以由某择地殓葬之意请诸各善董。各善董有难色，盖惧于威，恐事泄株累也。余不得已，遂以电话达此意于江孔殷太史，求太史一助力。太史遂转电告善董，谓此事可力任，纵有不测，彼可负全责。各善董得太史电，乃允余请。余遂去，顾思何处得一善地以为诸烈士墓所。偶忆某牙医新购一地于东门外沙河，此事或可慨让。遂遣医生之庐而请谒焉。告以此事，医生慨然相许诺，且谓地价毋急偿，区区数百金，唯公便。余闻而德医生，谓七十二烈士英灵其可妥也。医生旋以地券相付，卒为旁人所尼，遂中止。余此时抚案大恸，医生意良不忍，乃告余曰：余可助君者，舍让地外，唯君欲。余知此地必不可得，不如别图。遂与医生贷金数十，去而复之广仁，抵座后，余五中俱裂，半晌哭不成声。善董见余举动失次，欲相慰顾，又不省其端绪。余痛少定，起告善董以余父名，乃曰：座中多为父执，讵忍盯不为小子助？并告以顷求让地弗得事。言次，乃泪涔涔下。维时善董徐君诘余曰：本堂有一段地，坐沙河马路旁，名红花岗，殆为本堂义地而未葬者，青草白地，可称干净土，棺殓营葬诸事，并由本堂任之。何如？余闻徐君言，为之悲感不自胜。奔赴岗视察，岗地势虽非巍壮，无以妥先灵，然于仓卒百难中得此，亦差足自慰。遂以电话与徐君约，星夜囑件执土功，晨起集议局前督葬事。时已昏夜，余乃还家。是日自朝至日中昃，余水米迄未沾唇吻，然亦不觉饥苦，终夕伏枕不成寐。

翌晨，即四月四日，见星而起，余妻知余有葬事，潜以帛裹余襟底，以寄哀思，并以辟秽丸数枚置囊中。余匆促出门去，八时抵尸场，件工未至，秽气触鼻欲呕，遂以丸塞鼻观。十时，件工更续舁棺至，棺皆薄板制者，余见而心滋痛，以为男儿死国事，虽以马革裹尸还葬幸耳，然桐棺三寸乃不可得，死者已矣，生者何心？欲另市棺易之。时旁有一善董，乃方便医院派来者，谓棺可由院另备，不必求诸市，余深感此君不置，遂易以院所备棺，以次成殓。当时伤心惨目，不可言喻。盖陈尸数日，继以夜雨，尸体霉胀，且各义士多被假发，发去脑裂，中横无数小虫蠕蠕动，体缚以铁索，多合二、三人为一束。呜呼！骈首死义，结局如斯，亦云惨矣！乃囑件工解缚分之，并去枷锁。件工故难之，予之钱而始允。旋殓旋舁诸葬所，件约百人，络绎于道。计自上午十一时始，迄下午四时止，乃毕殓事……是日也，风雨愁云，行人绝迹，马路中憧憧往来者，惟殓尸件工，皆若寒蝉，噤不敢声，此情此景，至今犹形梦寐中也。余随最后一棺，步送到红花岗。岗上坟分四横直列，为先一夕囑土工照式经营者。惟掘地不深，余遂以医生所贷金与土工，囑为深掘而后营葬。葬至首列时已薄暮，细雨仍绵绵不止。余以党祸方急，伺人四布，夜行有戒心，乃囑土工妥为深葬，遂归。

潘达微参与了黄花岗起义的组织工作，他的妻子陈伟庄在那段日子里，常常扮作新嫁娘归宁，或带着女儿潘剑棱（后更名潘苏）一起坐着轿子去祝寿送礼的方式为革命党人偷运弹药。在这场“直可惊天地，泣鬼神”（孙中山语）的一役中，潘达微“险些名列黄花岗上”，幸而不死。然而，为战

友收殓遗骸的经历比瞬间壮烈的牺牲更加悲壮惨烈！在虏焰方张之时，他凭着一腔忠肝义胆，慷慨奔走呼号；在凄风惨雾的笼罩下，在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的情势中，他从容而行，把七十二位战友的尸体送到墓地。

潘达微了然一身为战友送行，然而，他深深地知道，他代表着孙中山、代表着起义的幸存者、代表着千千万万同盟会的同志为烈士送行！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为烈士作最后的致敬！

对于潘达微收殓烈士遗骸的壮举，亲友不理解，多以言相讽相讥，他忍了；而他此举暴露了党人的身份，使清吏上下为之震惊，一面大叫上当，一面拍案骂潘达微是地道的“无赖”，更欲以此兴党狱，对他进行跟踪侦察，务置他于死地而后快。党人劝他暂时离开，然潘达微不走不避，他凛凛然曰：“盖党人视死地为乐所，余身命久置之度外矣，胡避为！”他还以一管大笔(25)，写下了《咨议局前新鬼录，黄花岗上党人碑》的一文，反击了保皇党的《国事报》欲构党狱的诬陷，披露了殒葬七十二烈士的始末，更把“红花岗”二字改为“黄花岗”，一则寓意先烈凌霜傲雪的高尚品格，二则务令烈士栖身之所的名字更显雄浑。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在海外“通电全世界，布告革命宗旨”(26)。以期引起海内外的关注、理解与支持。为此潘达微又以春秋之笔，创作了《焚攻督署》(27)一画，把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的历史定格在革命党人不怕牺牲，焚攻督署，英勇战斗的瞬间，表现了“种族义彰，俊杰奋发，讨贼义师，爰起百粤。觥觥诸子，气振风雷，三日血战，虏胆为摧”(28)的战斗场景，显示了革命党人一一那些挑起了中国命运的民族脊梁的的昂昂英气。图附短文以记之：

三月廿九晚五点钟，革党猝起。有一坐肩舆，率众直平督署。署门卫兵，与相抗，不敌，随关左侧门，为党人炸弹轰开，遂入。当入时，有一人身躯雄伟，面貌粗怪，手持两短枪，向大堂一路直轰，复投炸弹。其余一面目瘦削者，吹号筒，指挥党徒直入，至二堂相继演说，略发挥种族主义，且言起事之由，词甚激昂。管带金振帮与战，不敌，被轰死。卫队死伤亦众。革党搜至上房，不见一人，遂纵火，督署燃烧一夜，火犹未熄，张督与家人，事前灵警，先逃去，故不及于难。

按：革命一事，当以广义观之，不必阻于某时某地。其年代湮远者，如法如美，姑不具论，即近年来土耳其之革命，葡萄牙之革命，墨西哥之革命，皆足惹起世人视线。今日中国而亦有此，能不慨歎！[印：政治问题]

这是一张历史上唯一的参与策划、组织黄花岗起义的画家正面描绘广州起义的历史画卷！

这是一张呼吁世人关注这次起义、更令“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的革命画卷！

这是一张理应载入中国革命史、美术史上的历史画卷！

当然，潘达微收殓烈士尸体后，从此结下了黄花情缘，在同期的《平民画报》上，发表了《黄花岗图》，画面是荒烟蔓草间，竖立着烈士的墓碑，离离宿草，埋恨千古；前景是参天松柏，虽则寥寥，然伟岸挺拔；后景衬以一轮明月，景色悲壮，浩然之气，至刚至大，充塞天地。题句为：“七十二坟秋草遍，更无人表汉将军。此陈元孝先生句也，移题黄花岗觉有馀味，读者以为如何？”

这可能是当年黄花岗真实的写照。当然，它也融合了作者的一片深情。

烈士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为革命的胜利打开了一条血路，激励人们前赴后继，在史册中留下了千古英名；而潘达微把他们的遗骸殒葬在黄花岗，不仅代表了革命党人安慰忠魂，而且还为中华民族建起了一座历史的丰碑，供后人万世景仰，成为全球炎黄子孙争相瞻仰的革命圣地。

这，是潘达微始料不及的！

### 无奈的皈依

1921年，潘达微痛心国事，皈依佛门。

从一个战斗在第一线的革命斗士，到最后遁入空门。这一轨迹，正浓缩地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从兴起到失败的全部历程。

在辛亥革命史上，众多的革命领导人或其中的精英后来都走上了皈依佛门的道路，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如众所周知的章太炎、苏曼殊、李叔同。潘达微也是其中一员。若笼而统之分析其原因，一是他们参加革命的目的不明确；时代与历史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革命的不彻底性；传统士大夫对于参禅的爱好，成为诱发他们日后“出世”的基因……但具体到潘达微的皈依，从哲学思想言之，是受章太炎所影响。

章太炎认为：所谓进化并不带来幸福、快乐和道德，而是乐进苦亦进，善进恶也进；“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所谓进化，幸福只是动物性的东西，无道德可言；只是自然规律，而非社会原理；革命者所奉行的应是心理与意志，“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提倡佛入地狱的道德精神和众生平等的道德理想。在章太炎看来，道德成为革命和一切进步的动力和目标，并身体力行，具有甘于艰苦、不畏牺牲的道德作风。(29)不过，潘达微的经历、际遇与心理历程与章太炎截然又有不同之处，因而成为我们研究的一个新的个案。

促使潘达微从一个为革命慷慨激昂、浴血奋战的战士走入佛门，有着极为错综复杂的社会因素。

殒葬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是潘达微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

黄花岗起义，潘达微不仅参与了组织工作，而且夫妇俩都参加了弹药的运输工作。当起义失败后，潘达微以《平民报》访员的身份才得以进城察看。面对七十二烈士被分成数叠体缚铁索、折臂断颈，血肉模糊，脑中蠕动小虫，业已霉胀的尸体，他伤心惨目，哭不能声。为此，他冒险犯难，终日奔走，各方求助，亲自觅地、筹款，甚至典当了自家的祖屋(30)，张罗件工、棺木，在遍地腥云，满街狼犬，惨雨愁云，行人绝迹的日子，独自一人作为烈士送行，亲自监督件工为解开铁链，洗净血迹，深掘深葬。一连数天，他面对的不是亲人、但比亲人还要亲、曾为同一个革命理想而浴血奋战的战友的尸体！这亲力亲为殒葬的全过程，是何等悲壮惨烈，震撼魂魄，让人刻骨铭心的经历！世界上有几人——哪怕是久战沙场的大将军一能有“缘”经历的？这经历无论对于谁，都无可避免地必然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深远影响。

笔者无法设想，假如革命取得了“真正的胜利”，假如烈士的鲜血能让革命者真正地觉醒，为人民谋幸福，潘达微走的又将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对于具有敏锐的政治头脑的潘达微和何剑士来说，当他们还没从愁云惨雾中回过神来时，已预感到笼罩在革命阵营中的阴影，看到了“革命军兴，革命党亡”的必然趋势(31)，而且很快就变成了事实：

在潘达微的参与下，广州得以在“兵不刃血”中光复。那些本来是“绿林豪杰”的民军开进广州后，便以为自己是有功之臣，凌驾在人民之上，抢劫行凶，谋财害命，遍地烟赌，腐化堕落，治安混乱，弄得人心惶惶……(32)这一残酷的现实使潘达微痛心疾首，促使他助陈景华严法整顿治安，但接二连三的事件令潘达微感到彻底的失望。

首先是“广东女子北伐队”之设。广东光复后，武汉形势危急，为迅速消灭清军，广州军政府组织“广东北伐军”。其后，邹鲁、高剑父也发起组织“广东女子北伐队”，队员二十余人，大都是曾

参加过同盟会的同志。1912年2月22日，她们抱“马革裹尸”之决心出发，但一个月后便失望而回。在这一个月里，发生了许许多多令人无法理解、无法接受的事实：北伐军从上到下，大多数认为革命成功，自己自然便是革命英雄了，因而威风十足，可以在人民之上，为所欲为，横行霸道，沉迷于嫖、赌、饮、吹的生活之中，奢侈腐化之风盛极一时，“几乎到了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地步，当江西北伐军叛变那一晚，广东北伐军将领有些还在下关‘过夜’，接到电话后不能进城亲临指挥，其他官兵在外宿娼的风气亦相当普遍，夜不归营的不乏其人。广东女子北伐军到了南京后，男女关系亦不正常，单经理局长邹鲁就搞了结成夫妻关系的二人，有婚约而不履行结婚的一人。”(33)可怜那些“女志士”在辛亥革命中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尤其是在历次起义前夕，都冒着生命危险参加运送弹药。她们以为革命已经成功、可以从此扬眉吐气了，如今却成为被玩弄、被遗忘的人，因而充满失望悲哀。黄扶庸原来是反抗盲婚而参加革命的，“回家后顽固的家长们仍不断胁迫她盲目出嫁，使她不得不经常离家逃避。本来想远出日本留学，但那时负责选派留学生的邹鲁因过去追求她不遂，怀恨在心，把她的护照拘留不发，使她无法成行。”后来黄扶庸与邓慕芬被潘达微安置到广东女子教养院工作。而不少人重新为奴为婢，有的甚至沦为妓女。理想幻灭，重新陷入彷徨苦闷的深渊，“一些人彷徨之余便和一些要员结婚（如宋铭璜与高剑父、许剑魂与邹鲁，陈秉卿与冯祝万等），算是解决了个人的‘出路’问题。”1913年讨袁失败，龙济光大批捕杀同盟会员，黄、邓避走港澳，从此失业，无家可归。“彼此感怀身世，同病相怜，结果便相约到肇庆鼎湖山上，携手同沉于飞水潭。”(34)“广东女子北伐队”从出征途中的遭遇到最后的归缩，使潘达微深深感到“悲怆之余，魂摇摇几不自持”。

如果说收殓七十二烈士尸体是历史长河的波峰浪谷、社会舞台上的暴风骤雨使潘达微重新感悟人生的话，那么，陈景华之死，却彻底改变了潘达微的人生之路。

陈景华被袁世凯密令杀害后，竟连棺材也买不到(35)。潘达微成为通缉犯远走他乡，但更让他揪心的是，龙济光还摧毁了他俩共同创办的女子教养院。那八百刚刚获得新生的女子与孤儿，随着陈景华的死，教养院被逼解散，大部分由旧主或父母领回，依然为奴为婢，馀下数十人，则被“定每人以年龄计算，每年售价五元，容貌略美者价八元。”“以女儿花作卖品，公然尽鬻，不留一人。”(36)这对于教养院的策划与创办者的潘达微而言，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始料不及的残酷而悲惨的结局。

陈景华的形象，时常萦绕在潘达微的脑间，龙济光倒台后，潘达微即协助陈景华的后人把陈景华的遗体移葬于香港的咖啡园，并在墓前的碑石刻上铭文：

强悍之令，猛以济宽。冤同三字，狱等覆盆。  
盖棺论定，毅力维新。哀我国民，丧此良人！

1917年编《天荒》杂志时，潘达微请人撰写了《青衣红泪记》，详细记录了陈景华办女子教养院从成立到解散的全过程，并把陈景华各时期的照片及手稿一一刊登，以示纪念。1926年，当潘达微再创《微笑》杂志时，他又在杂志上发表了《我思陈景华》的诗：

遍地盗贼，无法抚剿，我思陈景华。  
乞丐满市，无人救济，我思陈景华。  
家家虐婢，惨无人道，我思陈景华。  
烟人领照，烟馆领牌，我思陈景华。  
私娼遍布，秀若无人，我思陈景华。  
商团专权，藉公营私，我思陈景华。

替姬卖淫，替女受虐，我思陈景华。  
军政中人，汽车卫队，我思陈景华。  
他作民国官，仍平民式步行。(37)

辛亥革命似乎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在全国取得了胜利，但它又以惊人的速度出现了强大的封建势力和封建意识猖狂反扑，军阀割据，帝制复辟，沉渣泛起的局面，使中国进入了最黑暗而又漫长的历史时期。孙中山、黄兴、谭人凤等对袁世凯等节节退让，进而原先的革命党人叛党投敌，导致军阀割据，内战不已，反革命派抓紧一切机会对革命党人残酷地进行镇压与屠杀，革命的呼号早已被袁世凯者流纵横捭阖的帝王权术和杀人如麻的血腥镇压所掩盖了，同时又令人民陷入更深重的痛苦与灾难之中。面对昔日的战友相继死去，面对着呼天号地的百姓，面对那些“以先觉自命，救世为言的一流人物”尽露丧尽廉耻、官迷心窍、趋炎附利、佞媚谄伪的真面目，潘达微深感残酷而冷峻的现实已没有什么法则、伦理、道德可以遵循。热情昂奋的时期已经过去，他陷入了深深的孤独与悲凉之中。这使他意识到：“余向主平等自由博爱者也，凡立一言，专就进取及物质上鼓吹之，今而知其谬也。自由平等，就物质上决不能行，纯在精神上而言耳。”(38)这与章太炎“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倡导入地狱的道德精神和众生平等的道德理想是不谋而合的。潘达微虽曾“惟冀吾之烦恼，籍之日消”，然而，“余入世以来，人我之见甚深，稍有抵触，镇日不宁，今甚悔之，惟此性终不能断绝”(39)。他还是力图以一己之微力，独自挑起实行“民生主义”的重担，在陈景华的支持下创办了一系列慈善公益活动，冀求“人人返其心，复其性，以求良心之所安，斯始为真自由平等”。(40)然而，袁世凯、龙济光粉碎了他的美梦。在经历了亡命之灾从上海回到香港后，他遇到了潦倒纵酒的画友何剑士、郑侣泉，见到了与自己同为避祸到港而无家可归的同盟会的女同志黄扶庸和邓慕芬——后来她们发出了“已死志士，昔之革命希望共和者，其结果今竟留与他人乐帝皇矣”、“不自由毋宁死”的感慨而投潭自尽，以为解脱——他又得知昔日的女同志梁荃芳在香港沦为妓女……环顾当年曾为推翻清朝建立共和的理想而不惜一切奋战的战友，不是战死沙场，就是在深重的苦难中挣扎；不是为黑暗所吞噬，就是为趋附势利而出卖良心。死者已矣，生者如何？现实生活与政治斗争使他成了一个体验着生与死、背负着一切苦难、面对着历史的荒坟与废墟的孤独者。恨海愁城中，每念故旧，益用凄其，泪与声迸，气同哽咽，百忧丛矢，万愁压石。悲哀无所托，遂集海内名家，以一枝哀毫，万点泪墨，费两年之力，“盖取天荒地老之义，聊写往来今古之情”，编成《天荒》一书，所集文章，记录了对已故友侪陈景华、苏曼殊、何剑士、黄扶庸、邓慕芬的追忆与怀念。《编天荒志成书感》二绝揭示了他内心巨大而深刻的孤独与惨淡而深重的悲哀：

人事苍茫百感哀，拼将心力付蒿莱。  
余情漫道无归宿，断幅零缣费剪裁。

一回检拾一辛酸，恨草啼花半泪痕。  
愿向情天重抖擞，纵横忧患不须论。

在《伤心人语》一文中，他叩问着那些轻身一掷而去的为黑暗势力镇压的幽灵，探讨着生与死的话题：

他喟叹那些英雄豪杰，“死后也是一堆腐骨，生为愚呆童竖、大奸巨恶，死后也还是一堆腐骨。”活着的人，虽也曾以过人的才识、智力，叱咤一时，驰骋万里，如今却“好像生物失了空气一样，无以养生，还有什么希望？横竖安心乐意去罢。或者死去还与所爱相晤于地下，总胜着投荒万里，委身

残冷，眼前无一见怜之人。”“在这五浊世界，装着一副假面目，与那龌龊社会接触，我又何苦来呢？”

然而，这里更多的是对社会愤怒的抗议：

“今日的世界，小而言之，今日的国家，再小而言之，今日国里的社会，国里的家庭，那一件不是令人可厌、令人无味的东西？”

“陆沉的事，是哲学家的理想，但这种世界，就是不陆沉，天地何曾有一日清明？人类何曾有一分幸福？日日想，实在终究是个空。”

“但再细思量起来，人心奸险，终无善法，今日世界，人心可算得坏到极点。真的日少，伪的日多，每日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实在不知多少，别的不说，即如以先觉自命救世为言的一流人物，不过如同唱悲剧的戏子一般，上了台却是行业所拘，不能不要做出悲悯为怀的形状来，其实他心里何曾有丝毫真观念呢？……”

他坦言：“我当初何曾不热心爱国？我何曾不热心救世哩？如今依我现在的思想观察起来，国要爱而不能爱，世可救而不能救。我向来不主张从物质上入手救世界的。我主张的是从精神上入手救世界的。”

这交织着血与泪凝成的文字，字里行间，反映了他在面对生与死的思考与人生的思考，焦灼而苦闷的呼问。尽管透出一股颓废伤感、哀凄侵冷、滋味苦涩的情丝，使人体验到一种连自己也无法说清的苦恼、困惑与彷徨，但却传递着近现代人才具有的那种个体主义的孤独感与宇宙苍茫感的个性特征。尽管他流露出在前景的渺茫，路途的荆棘中沉甸甸的悲观情绪，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他仍在苦苦地冀盼，仍在艰难地求索。

当“辛亥革命成功之后，而革命党名义取消，中华民国即为武人所摧残。十年来名为民国，实为官僚国，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41）的境况下，连孙中山在黑暗和孤立中也无法找到出路，此时的潘达微主张以精神救世，冀盼并“愿向情天重抖擞”，这在当时无疑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但亦具有一定积极的意义。尽管后人对潘达微对《天荒》中一些文章、特别是潘达微的生死观颇具争议（42），但如果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它进行观照，我们便可感受到潘达微那颗被悲哀包裹着、压缩着但仍涌动着热血的心，在低沉、消极甚至似乎颓废的情丝中，又燃烧着从深重的悲哀中喷发出来的强烈的愤慨。亦如参与《天荒》编辑工作的孙仲英所言：“冷残本嗜哀，欲以悲词苦语，唤起众生，故其提倡革命，一本之于哀，兵法所云得哀者胜欤。”（43）

1921年，潘达微皈依佛门，法号“妙化”，成为“住家居士”，似乎真的从此“出世”逃于禅，每日诵经而不问世事了。其实他提倡佛学，正如章太炎所说：“佛教最恨君权”，“佛教最重平等。”这体现了他提倡佛入地狱的道德精神和众生平等的理想。

事实上，命运注定了潘达微是不可能“出世”的。

首先是他“入世以来，人我之见甚深，稍有抵触，镇日不宁，今甚悔之，惟此性终不能断绝”的个性之使然，决定了他对于社会中种种不平，虽然再也无法像启蒙期那样狂暴的喊叫，振臂的激昂，但他无法躲在佛堂中“入静”。

最为重要者，殒葬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独特的经历，注定了他必须一生一世背负着他们的英魂去思考生与死这一人类所面临的永恒的课题。对于潘达微来说，烈士的英魂是永远挥之不去的。殒葬完烈士的尸骸后，他不仅把红花岗更名为黄花岗，而且还在自己的画案上置放了一个骷髅，以最独特的方式与烈士的英魂建立起一种为世所罕见的特殊关系——它既不同于西方的文人雅士能以获得一个骷髅头把玩作为时髦的追求，也不仅仅是西方浪漫主义的象征。这是对战友悲壮牺牲的赞美与讴歌；它显示着潘达微自觉地挑起烈士守护神的角色与义务，也意味着他决心弘扬烈士遗志的决心。当然，它也昭示着潘达微对死亡与权势的挑战！从此，黄花骷髅的情结，陪伴着潘达微的一生。每年的三·二九，他

都要去给烈士扫墓，1914年的黄花节由于龙济光祸粤，处境险恶，无法亲往，他便让儿女身穿白袍白服，肩披白带，带上写着“黄花岗之子”、“黄花岗之女”，骑着白马，作为烈士的孝子代表他前往拜祭。复与何剑士、梁培基等三五知己，午夜携酒，至荒郊野冢之中，背负着黄花岗上的雄鬼英魂，张席共饮，放怀悲歌，共唱秋坟，共同纪念着、体验着生与死；每逢黄花节和重阳，他都要面对骷髅挥毫作画，以寄哀思。

1912年民国成立后，潘达微首倡公祭七十二烈士，孙中山亲自前往主祭，随即潘达微首倡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鉴于“烈士墓茔，不封不树，无以壮观瞻”，拟就地“崇大其墓，俾资景仰”，孙中山亲自领衔主理，潘达微任协理。然而，由于正值变乱纷逞，角声四起、经费短缺的时期，工程迟迟未能进行。后因龙济光祸粤，修理墓园之事中辍，烈士之墓，仍是黄土一抔，湮于荒烟蔓草之间。1916年，广东省参议会再提前案，林森为此发起向海外捐款。1918年秋，由于滇军师长方声涛（七十二烈士中方声洞之兄）募款修建七十二烈士之墓，修筑工作方进入具体阶段。据潘达微的故交黄金海介绍，潘达微为修建黄花岗陵墓，废寝忘餐，从设计到修筑工程，事无巨细，皆亲力亲为。大至陵墓设计的布局、风格，小至石材的选择、各种雕塑的花纹图案的搭配，都是由他亲自决定的。在修筑过程中，他不时征求朋友的意见。黄老说：潘达微曾欲在纪念碑的文字上贴金箔，征求黄金海的意见。黄提出贴金箔固然好，但在容易惹起不轨之人揭去。故在黄的建议下，改用上等石绿，并请黄代选材料及工匠进行。在墓园的设计上，潘达微匠心独运，在墓道两侧，以骷髅作铁柱之顶，个个骷髅，眦目裂齿，各具形态(44)，它们如他案头的骷髅一样，似在警示自己与世人永远不要忘记这“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传世而不朽”历史！“以继述先烈遗志，且光大之”。（孙中山语）1921年，十年来潘达微梦牵魂绕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与记功坊终于落成，稍慰先烈在天之灵。然而，如孙中山所言：“环顾国内贼氛方炽，机隍之象，视清季有加。”(45)更有甚者，过去曾是文武官员在此下马的烈士安息的圣地，在孙中山逝世之后，经营黄花岗者，在墓园内设“黄花别馆”，茶室、冰室，果饼点心，或星期一换，应有尽有……粤中诸要人，亦常驻足黄花别馆”，成为他们的“游宴之所”(46)。潘达微面对画案上朝夕相处的骷髅，倍感哀伤，每每“回首黄花岗上，碧血青磷，鬼雄夜啸，抚衷自问，诚无以对诸先烈在天之灵……徒觉汗颜无地。”(47)然先烈之灵，时时“犹形梦寝中”，拷问着他的灵魂，令他镇日恒不宁。晚年病重时，那些英魂仍时时“浴血提头，昂藏入梦，相对恸哭”。因此，尽管他走进佛门多年，尽管他的挚友邓尔雅为他书写了“罢了”两个大字，希望他能走出痛苦之海，但他仍坦然承认：“独有触感情者，间忆及耳，缘所历过去境界，如镜现形，障之则一物皆无，启之复万象毕现。吾人六尘未净！”(48)这惨淡深重的孤独与悲哀，使他无法麻木、无法消沉、无法“出世”。

潘达微曾经一度是政治革命的领导者，他的新旧盟友、朋友也不可能让他“出世”的。老共产党员谭天度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当时共产党人是很钦佩潘达微先生的，也很重视他。国共合作后，我从廖仲恺那里知道孙中山和廖仲恺先生都很敬重潘达微先生，他们的关系都非常密切，在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以及北伐等重大问题，都要听取他的意见，并得到他的支持。后来我在和梁培基的接触中，了解到他们之间有非同寻常的私谊，所以经常通过梁培基向他传递我们党的方针路线，及时了解我们的革命主张。使他能逐步理解、同情和支持我们(49)。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当全国革命运动不断高涨，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统一和巩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群众中的威信日益提高之际，潘达微对中国的前途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根据他女儿的回忆，在她十岁左右的时候（即1925、1926年间），父亲经常带着她四出演讲，内容不离“革命”(50)；1925年10月，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各地群众展开反陈炯明之斗争取得节节胜利，潘氏闻之，作《秋菊图》，上题：一夜秋风起，黄花照眼明，莫愁霜露冷，好梦是凄清；1926年，潘达微编《微笑》画刊时，由衷地指出：“中国今日由宗法时代转入变迁时期，除不多数的明哲者，实行向前锋指领外，无论何等宣传，都不能解现社会混乱的纠纷。”表明了他对

共产党所寄予的殷切的期望与信赖。时值北伐之始，又作一诗曰：“军阀祸我民，问谁不切齿？男儿生世间，报国唯一死。投袂随北征，挺身冒锋矢。胜败何足论，前赴后继起。起起复起起，军阀还有几”（51）；同时又派出摄影师拍摄“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与阅兵典礼”的照片；对于廖仲恺被暗杀，潘达微深感悲痛，当广东各界召开廖仲恺、陈秋霖二公殉难一周年纪念大会时，也派出摄影师拍摄了纪念会的历史照片（52）；当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策动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东反动派在广州大举逮捕、屠杀了二千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后，潘达微对那些惨遭杀害的共产党人和群众表示深切的同情，并在4月30日（农历三·二九）黄花节时写下了“黄菊红棉图”（又名《双花并茂图》），上题“吾粤两般千古事，黄花开后又红花。”把这些死难者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并而论之，把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与辛亥革命称之为广东永垂史册的千古大事。1927年12月9日，告别仕途十多年的他欣然“重出江湖”，担任广州市公益局长的职务，但上任数天，广州起义失败，潘达微立即辞官归里，同时拍下了《永远安息》的艺术照片，画面全是坟墓和十字架，采用了强烈的自然光，让人透过坟墓，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

这个“革命弥陀”，永远心系着民族与家国，胸中翻滚着无法平息的波涛！静与动，出世与入世，对他来说，是最艰难的抉择。

### 黄花情结：永葆岁寒之身

潘达微这个桀骜不驯的奇才，自号冷残，却又一腔热血，为革命呼号，出生入死，能人所不能；他悲天悯人，慈善为怀，却又容不得半点人间的猥琐龌龊丑态；皈依佛门，却又无法拏整磬……

1929年，潘达微离开了人间，然而，他的黄花情未了。

家属根据他的遗愿，经国民党中央及国务会议同意，本可附葬于黄花岗，但复杂的社会原因，却未能如愿。

1951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把他的墓移葬于七十二烈士墓旁。他永远成为七十二烈士的守护神！

随着广州起义的失败，时局急促地变化，令刚刚重燃起革命希望的潘达微更加失望。他昔日患难的同志，不少已经成为有权有势、炙手可热的党国要人，也曾向他招手，但他决不与他们同流合污，始终保持清节高标。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他得了肺病，在养病中以书画及摄影艺术寄情。

此时的潘达微，喜作观音大士图，每年的观音诞，他都要舌血写一观音像。

不过，黄菊、青松、翠竹，是他情有独钟的画材。无论是在书画赈灾会中与高奇峰、邓芬等即席挥毫之合作画，还是缅怀先烈的画图，无不以菊松入画。

这两年，他继续进行摄影艺术的探索，拍下了不少人物、人体、风景的艺术照片，但他却时时把镜头对准劳苦大众，他参加日本国际摄影展览的作品，拍的就是一群在等待顾客而无奈的黄包车夫。

不过，正如他的朋友所说，他在晚年的作品中，更多的是记录了他“在坟墓里头挣扎，在油锅之上跳舞，在黑沉沉的夜里找太阳”的心路历程，表现了这个“佛化美术家”“不安分的灵魂。”（53）。是的，在潘达微生命最后一年的作品是最具震撼力的：

1929年春节，广州中央公园举行菊展会，潘达微以瓷植黄菊一株，旁置一骷髅，题曰《碧血黄花》参展，意义深远，为人激赏。随后，他又创作了以悲歌署名的《黄花寥落》、《黄花白骨》